

二、戰爭思想

思想是行動的指針，是力量的根源，一種戰爭必有一種戰爭的思想。德國兵學大師克勞塞維慈在其不朽的傑作「戰爭論」一書說：「戰爭是起因於戰事爆發時所存在之各種思想觀念等關係，復因此等關係，而使戰爭有種種形態。」

中國過去的歷史是戰爭起伏的歷史，今後的歷史，在世界未大同前，當然也免不掉戰爭的發生，但今後的戰爭思想，是不容再紛歧或錯誤了，分歧則力量分散，難期勝利，錯誤則輕舉妄動，禍國殃民。所以必須建立一種正確的戰爭思想，以為今後戰爭行動的南針。

尤其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主義思想的戰爭，正如日本軍事家土居明夫說：「下次戰爭是主義與世界觀的戰爭。……下次戰爭倘若是主義思想的戰爭，物質的戰爭，長期的戰爭，則主義思想的光明正大者，資源生產、科學技術優越者勝利，在綜合此種戰力的總體戰上，能勝者勝利。」（註一）足見這個無形的戰爭，與有形的軍事武力的戰爭有著同樣的重要性。在主義思想的戰爭中，其光明正大者必可獲勝，反之必敗，稍一檢討過去我們北伐的勝利，及法西斯德日意在二次大戰中的失敗，已可得到答案，這更使我們非從速把我們的戰爭思想建立起來不可。

縱觀現代世界的戰爭思想，自德日意失敗之後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經已崩壞，迄今猶存的，可分為兩大體系：一為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，一為共產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，前者以自由與和平為目的，美國為其代表，後者以侵略與奴役為目的，蘇俄為其代表，兩相比較，已可推斷蘇俄在來日三次大戰中是必敗的。

今日我們所要建立的戰爭思想，當然是反對俄式共產主義的戰爭思想，而應與美國諸民主國家的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相協調，相一致，始為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群之需要。」（「自傳」）

大凡戰爭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，國父的三民主義是我們的政治思想。自然我們的戰爭思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，即為實行三民主義，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而戰的戰爭思想。但為實現三民主義，在現階段，首要反共抗俄，可見今日世界各民主國家亦莫不正在反共抗俄，可見反共抗俄是國際性的，非一二國家的事，亦唯有全球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，始可爭取反共抗俄的勝利。

正如下面所述，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的本質，是為求生存的，求和平的，又是反極權的，反侵略的，這是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相協調，相一致，抑且更為進步和完美。因為民主主義尚帶有資本主義的氣味，而三民主義則無。所以今日

為建立中國的戰爭思想，只有從三民主義中（國父全部遺教俱可歸結於三民主義）來發掘和建立了。

克勞塞維慈氏關於戰爭的定義說：「戰爭的基本要素，是兩人以上之間的鬪爭，即決鬪，戰爭不外是決鬪的擴大。」跟著說：「戰爭是為屈服敵人，以實現我意志所用的暴力行為。」國父對於戰爭這個術語，雖然沒有下過一個完整的定義，卻說過：「人同人爭，國同國爭，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，……國內相爭，人民同君主相爭。」（「民權主義」第一講）克氏又說：「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的行動，實為一種政治的手段，政治上對外關係的一繼續，而以其他手段（暴力行為——浴日註）施行之。」國父亦認戰爭屬於政治的形態，他說：「政治的海陸軍力」，跟著又說：「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：一是兵力，一是外交。」（「民族主義」第二講）所以我想 國父一定讀到克氏「戰爭論」而受其影響的。於此，我可再舉出一些例證來：克氏說：「凡為指揮一種戰爭或一幕戰役的重大活動，而取得光榮的勝利，非具有政治上的特別高見不可，所以戰爭和政治是一致，將帥也是政治家。」國父說：「現代軍人只懂得軍事是不夠的，軍事以外還必須了解政治。」（「政治基礎在於地方自治」談話）又說：「如果說軍人不干涉政治，還可以講得通，但說不懂政治，便講不通了。用為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，所以軍人當然要懂政治，要明白什麼是政治。」（「民權主義」第一講）克氏「戰爭論」是世界軍事名者，也是一種戰爭哲學，不特軍人應該精讀，即一般思想家亦應人手一卷。它是政治家、外交家、顧問及一切與政務有關者的枕中祕本。誠如 國父的好學與博學，尤以指導戰爭的需要，自不會不知道這部名著，又不會不加以深刻研究，雖說目前未找到更確鑿的證據，但依於上述的對照已可以推知其究竟了。但 國父與克氏亦有不同之點，就是 國父不是克氏為戰爭而戰爭的論者，乃是為革命而戰爭的論者，他一面反對「野蠻」與「弱肉強食」的侵略戰爭，另一面卻主張「以戰止戰」，「為人類作干城，為進化除障礙」的革命戰爭。（「戰爭入門序」）亦即為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戰爭，可見他的戰爭思想比克氏來得正確和進步。

其次， 國父對於戰爭發生的見解，不是看做偶然的現象，也不是看做經常的現象。他認為有國家即有戰爭，戰爭是國家間不可避免的現象，又為一種不得已的舉動，他說：「論國家之起源，大概以侵略人之目的，或以避免人侵略之目的而為結合，其侵略人固為戰爭，即欲避人侵略亦不能避去戰爭。……以一國而為戰爭，萬不得已之事也。……凡國家之政策既定，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自的，外交手段既盡，始可及於戰爭，戰爭既畢，仍當復於外交之序。故國與國遇，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，均為行政策所不可闕者。然用外交手段之時多，用戰爭手段之時少，用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軌則，戰爭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。不得已云者，外交手段既盡，無可如何之謂也。」（「中國存亡問題」）他又認為在革命過程中，戰爭亦為不可避免的現象，誠以革命是最艱鉅的事業，或為推翻統治者，或為打倒侵略者，不是完全採取和平的手段所可奏效，不得已時還要訴諸流血的戰爭。故 國父致力革命之始，即揭櫫「趨除韃虜」的綱領（「同盟會宣言」）。又在手訂建國大綱上制定「軍政時期」為革命建設步驟的第一個時期，

即第六條：「在軍政時期，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，政府一面用兵以掃除國內之障礙，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，而促進國家之統一。」于此又可見國父并不同過去法西斯主義者謳歌戰爭為「創造之父，文化之母。」又不同現在赤色共產主義者以階級鬭爭為社會進化原動力，到處發動侵略的戰爭。至於根據國父最高的理想，戰爭並不是永遠不會消滅的，卻有待於大同世界的實現。這個大同世界的內容，正如 國父親書禮記大同篇說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」這便是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，亦即三民主義最高理想的實現。

國父的戰爭思想是三民主講的戰爭思想，已如前述，而我們基於戰爭哲學的觀點，在國父的全部遺教中，卻可以發現他的戰爭思想是建立於「生存」與「和平」的基礎之上，即它的本質是為「生存」與「和平」而戰。茲分述如下：

一、為生存而戰

這可以說是 國父戰爭思想的核心。三民主義的基礎是民生哲學。 國父說：「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」就是經濟的中心，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，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。」（「民生主義」第一講）又說：「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，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。」（全）又說：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，才是歷史的重心。」（全）再又說：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，就是因為要求生存，人類有不間斷的生存，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，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，是人類求生存，人類求生存，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。」雖說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，卻是人類求生存的一種手段，亦即說人類社會民族國家遭受生存的威脅——別國的侵略時，則非斷然採取戰爭的手段不可，否則，便不能自衛，維持其生存，而陷於滅亡。至於侵入人國，以掠奪財富，擴大空間為目的戰爭，則非革命的戰爭，自然亦非 國父所謂「求生存。」 國父說得更明白：「人類如能夠生存，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：第一件是保，第二件是養，保和養兩件大事，是人類天天要做的，保就是自衛，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，要有自衛的能力，才能夠生存。……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，便要奮鬥。（註二）（「民權主義」第一講）這裡所謂自衛的能力，當然是指武力，唯擁有足以自衛的武力，亦即能戰的武力，始能維持民族國家的生存。又說：「吾中華民族，和平守法，根於天性，非出於自衛（即為求生存——浴日註）之不得已，決不肯輕啟戰爭。」（「臨時大總統告友邦書」）亦即說戰則為求民族國家的生存。而非為侵略。又說：「吾人初不以黷武善戰策我同胞，然處競爭據烈之時代，不知求自衛之道，則不適於生存。」（「精武本記序」）又， 國父於民元解職後，在香港與西報記者談話說：「惟吾意中國無侵略志，因吾人志尚和平。吾人之所以要水陸大軍者，只為自保（即為求生存——浴日註）而非攻人，若果歐人勢逼吾人，則

吾人將以武力強國。」（「南北統一後之政治與外交方針」談話）依此可見 國父的戰爭思想是以民族國家的生存為核心，昭然若揭。他發動推翻滿清，是為求中華民族的生存，他主張抵抗帝俄，也是為求中華民族的生存，他屢次興師討賊，也是為求中華民族的生存。至於我們過去對日抗戰，與現在的反共抗俄，也是繼承 國父的遺志，為求中華民族的生存。本來魯登道夫將軍在「全體性戰爭」一書上，也是主張為求生存而戰的，他說：「全體性的戰爭之目的，在於民族生存之維持。」實則他僅為求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，在大日耳曼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之下，他可以犧牲別個民族的主存，即他只要自己民族的生存，不要別個民族的生存。我 國父則比他正確和進步，即要自己民族國家的生存，同樣也要別個民族國家的生存，扶助別個民族國家的生存，正如 國父所主張的「濟弱扶傾」。（「民族主義」第六講）

二、為和平而戰

和平與戰爭本是對立的現象，也是統一的現象。主張和平不能否認戰爭，主張戰爭亦不能否認和平。但我們今後的戰爭，則不可徒為戰爭而戰爭，更不可為侵略而戰爭，應為和平而戰爭，戰則要打破一切不和不平的現象而使歸於和平，亦即說戰爭僅為和平的手段，而和平才是戰爭的目的，唯有這樣才是革命的戰爭。這便是 國父戰爭思想的第二個本質。中國人的天性，愛好和平， 國父的天性更愛好和平，不得已而戰，乃以和平為目的。民元前一年在香港舟次對胡漢民說：「且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，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，何必以兵？今之大患即在無政府，如能創建政府，則滿清之政府固必傾覆，即袁世凱亦未必能支，必不足以為患於新政府，故不宜預防他人之不服，而一意謀以武力爭天下也。」（「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即不必用其兵」談話）於此可見 國父不是一個好戰者，也不是一個武力崇拜者，其愛好和平的天性溢於言表。民十四逝世的彌留時對同志說：「余此次放棄兩廣北上，實為和平統一而來，」又反復斷續的說：「和平！奮鬥！救中國！」益見愛好和平的天性。愛好和平既是 國父的天性，至於不得已而戰，係為和平而戰。 國父說：「中華民國之創造者，其目的為和平。」（「實業計劃結論」）這是說為打破滿清對我漢族的不和不平，才發動推翻滿清的戰爭，依於戰爭的勝利，而創造中華民國，即創造新的和平，達到和平的目的。尤值得注意的， 國父發動推翻滿清的戰爭係出於不得已而在和平絕望之後，民元就臨時大總統告各友邦書說：「自滿清盜竊中國，於今二百六十有八年，其間虐政，罄竹難書，吾民族唯有隱忍受之，如倒懸之得解，求自由而企進步，亦常為改革之要求，而終勉求所以和平解決之道，初不欲見諸流血之慘也。屢起屢蹶，卒難達吾人之目的，至於今日，實忍無能忍。吾人鑒於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，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，是用訴之武力，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於萬重羈軛。」民十三神戶演講說：「要請歐洲人之在亞洲者，俱以和平方法，退還亞洲人之權利，如果不能達到目的，便當訴諸武力。」（「大亞洲主義」）這是說和平方法失效後，始可訴諸戰爭，戰爭則為達到和平的目的。其次 國父常贊揚中國人素愛好和平的天性說：「中國人民本甚和平，現在世界上，立國百有數

十，雄強相處，難保不有戰爭發生。惟中國數千年來，即知和平為世界之真理，人人均抱有此種思想，故數千年來之中國，純向和平以進行。中華民國有此民數，有此民習，何難登世界舞臺之上，與各國交際，共謀世界之和平。此種和平運動，即中華民國國民之天職。」（「中國人之天職在促進世界和平」講詞）又指出愛和平為中國一種極好的固有道德說：「中國更有了一種極好的道德，是愛和平。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民族，只有中國是講和平，外國都是講戰爭，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。近來因為經過許多大戰，殘殺太大，方主張免去戰爭，開了好幾次知平會議。像從前海牙會議，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，金那瓦會議，華盛頓會議，最近的洛桑會議。但是這些會議，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，是因為怕戰爭，出於勉強而然的，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。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，論到個人便重謙讓，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，和外國人有大大的不同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種種的舊道德，固然是駕乎外國人，說到和平的道德，更是駕乎外國人。這種特別的好道德，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，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，不但是要保存，並且要發揚光大，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。」（「民權主義」第六講）并再三呼籲「維持世界和平」（散見遺教中），我們深望外國人能夠了解我民族暨 國父這個優點。同時也希望外國人亦能具此優點，不來侵略我們，又不去侵略人家，共同維持世界的和平。

要之，愛好和平的精神是貫通著 國父整個思想的，其表現於戰爭上，則為「為和平而戰」。我們過去對日抗戰及今日反共抗俄，就是爭取中國的和平與世界的和平，同時也是發揚 國父倡導和平的偉大精神。

以上係就 國父戰爭思想的本質，亦即戰爭的基本觀念，以下我且就形式上，亦即戰爭的對象來談，這是上述本質的進一步說明，而後者「為抵抗侵略而戰」又成為前者「為剷除障礙而戰」的說明。

三、為剷除障礙而戰

國民革命的障礙有三：一曰專制君主，一曰封建軍閥，一曰帝國主義，這三大障礙物，如果沒有根本剷除，則國民革命無由成功，民族國家亦無從生存發展與和平。但欲根本剷除這三大障礙，除作和平的奮鬥外，不得已時還須訴諸流血的戰爭。所以 國父當進行推翻專制君主的滿清之時，便倡率起義，採取戰爭手段。同盟會宣言說：「滿清政府，窮兇極惡，今已貫盈，義師所指，覆彼政府，還我主權。」自滿清被推翻之後，繼之而起便是封建軍閥，于是便先後實行討袁、護法、討莫、討陸、討陳、討沈及北伐曹吳。 國父說：「軍事的奮鬥，推翻不良的政府，趕走一般軍閥官僚。」（「黨員不可存心做官」講詞）又說：「四年以來，愛國之士，討伐軍閥及賣國賊，無非為護法主義及國家生存計，此不能名為南北之爭，實共和主義與軍閥主義宣戰，愛國者與禍國者宣戰而已。」（「就非常總統後對外宣言」）又說：「今將開始一新時期，為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，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。」（「為廣州商團事件對外宣

言」)又說:「北伐之目的,不僅在覆滅曹吳,尤在曹吳覆滅之後,永無同樣繼起之人。換言之,北伐之目的,不僅在推倒軍閥,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。蓋必如是,然後國民革命之目的,乃得以掃除障礙之故而活潑遠行也。」

(「北上宣言」)并在民族主義裡強調打倒帝國主義,民權主義裡強調打倒封建軍閥,因為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不打倒,則民族、民權主義無從實現,民生主義亦無由著手。過去北伐的成功,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打倒(抗戰勝利)。可以說國民革命的障礙殆已經剷除淨盡。否料,朱毛共幫又繼起與俄帝狼狽為奸,盤據大陸,拊制人民,屠殺無辜,摧殘民族,出賣國家,成為我們國民革命的新障礙。今日我們正欲打回大陸,肅清共幫,驅除俄帝,就是為剷除國民革命的新障礙,亦可謂:「為反極權而戰」,「為自由而戰」,因共產太極權太剝削人民的自由了。

四、為抵抗侵略而戰

一國當外患之來,很明顯的,抵抗就是自衛的生路,屈服就是自殺的死路。大凡一個民族國家之亡,是亡於失敗主義,投降主義。如抱著抵抗主義,為抵抗侵略而戰,亦即所謂「為反侵略而戰」,有時雖告失敗,終必獲勝。近代中國受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已達於極點,故 國父在民族主義裡大聲疾呼民族精神以抵抗之,說:「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,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他。」又說:

「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,在自己先有團體,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顧國家,便有辦法,無論對那一個,都可以抵抗。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:一是積極的,這種方法,就是振起民族精神,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。二是消極的,這種方法是不合作,不合作是消極的抵抗,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,以維持民族的地位,免致滅亡。」始終未主張侵略人家,不獨不主張,且反對之。又在其手訂建國大綱上訂有「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,政府當抵禦之。」的條文,這是進而確定抵抗侵略為國策的。又 國父實業計一書的結論說:「今則日本之軍閥政策,欲以獨力併吞中國……今中國已醒覺,日本即欲實行其侵略政策,中國人亦必出而拒絕之。」這是 國父主張「為抵抗侵略而戰」的更具體主張,亦即我們過去對日抗戰的根據,依於抗戰的勝利,果得維持中華民族的生存,亦盡了維持世界和平的義務。

至於俄國處心積慮之欲亡我, 國父早已洞若觀火,見於民前十三年撰支那現勢地圖跋說:「中國輿圖以俄人所繪者精審,蓋俄早具蕭何之智,久已視此中華土地為彼囊中之物矣。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險要,城郭人民,較之他國輿地家尤為留意。」今日以大彼得自命,又繼承沙皇衣鉢的大獨裁者史達林,朱毛共幫已為其所控制,而把中國整個大陸作「囊中之物矣。」不待說,這是我們民族遭受著一次空前未有的大侵略,我們為維持民族生存與世界和平,則非反共抗俄不可,尤應與世界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打倒莫斯科,把 國父抗俄的精神與計劃實現於今日!

當民國元年，帝俄侵我外蒙古甚急，製造所謂「庫倫獨立」，旋以俄蒙協約，迫我承認，野心勃勃，節節進逼，駸駸乎有囊括我東北各省之勢。這時 國父為打破這個危機，便以在野之身，堅決地提出對俄抗戰的主張，在其錢幣革命通電上說：「今者俄人乘我建設未定，金融恐慌，而攫我外蒙古，以常情論之，我萬無能抵抗之理，在俄人固知之素，而審之熟，故甘冒不韙行之。我國人皆知蒙亡國亡，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，孰若抗俄而為壯烈之亡。」跟著說：「與其俯首聽人之瓜分，何若發奮一戰，以戰強俄，而固我國基於萬代之為愈也。況當此民氣正盛，國體方新，戰有必勝之道，不戰為必亡之階，孰利孰害，不待智者之決也。縱以常理論之，今日戰亦亡，不戰亦亡，與其屈於霸道強權而亡，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，一戰不獨不亡，而更可揚國光，衛人道，伸公理於世界也。」國父為糾正當時北京政府和議派的錯誤主張，在該電文上又大聲疾呼說：「語曰：『能戰而後能和』，惟我今日不能戰，故俄敢公然侵我領土，若徒然與辦交涉，與之言仲裁，悉歸無效。」 國父這個偉大的主張，因當時北京軍閥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，未能實現，致把外蒙古的主權斷送於俄人。可見不抵抗主義的危險。至於國父當時抗俄的作戰計劃，係主張採取長期的作戰計劃，正如該電文說：「必備屢戰屢敗而氣卒不撓，乃能求最終之一勝。語有之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今俄有常兵百萬，戰時兵五百萬，我現在練兵五十萬，民兵無量數。就俄之現勢而觀，六個月之內，必難出至五十萬兵，而我則於此期之內，可出五十萬。於外蒙北滿六個月之後，又可加練新兵五十萬。然以此而敵俄，在第一年之戰，勝負未可知。惟第二年，我當出兵二百萬，意料中當可逐俄出滿蒙之野，而復我黑龍江沿海州之侵地。然萬一仍敗，則第三年當出兵四百萬，若猶不能得利，則第四年當出兵六百萬，則未有不勝者也。在此期內，俄必有財政之恐慌，革命之起義，與我可乘之隙者甚多。若彼猶不屈服，則期第五年之大舉，必出兵至八百萬或至千萬，必直抵莫斯科聖彼得堡而後已。」真是我們今日反共抗俄的南針。

以上便是 國父戰爭思想的本質，亦即 國父的戰爭觀，依此而論，自然他是反對軍閥的戰爭，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，關於前者，他說：「軍閥惟知以武力據地盤，以欺詐權利。」（「覆蕭翼、楊道馨函」）國父釐定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亦說：「事實上，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，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僱傭軍隊，推其結果，不能不出於戰爭，出於搶奪，蓋搶奪於鄰省，較之搶奪於本省為尤易也。」關於後者，他說：「國際戰爭者無他，純然一簡直有組織之大強盜行為耳。故對此種強盜行為，凡有心人，莫深疾痛恨之。」（「實業計劃結論」）又說：「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，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，因為當時的戰爭，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，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，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。所以戰爭的結果，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個帝國主義，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。」（「民權主義」第四講）關於階級戰爭呢？ 國父認為階級戰爭，是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，在今日的中國則不能發動此種戰爭，他說：「階級戰爭，即工人與資本家之戰爭也。此種之戰爭，現已發動於各工業國家者，極形劇烈。在工人則自以為得最後之勝利，在資本家則決意以為最苦之壓迫，故此種戰爭，何時可以終局，如何可以解決，無人敢預言

之者。中國因工業進步之遲緩，故就形式上觀之，尚未流入階級戰爭中。吾國之所謂工人者，通稱為苦力，而其生活只以手為飯碗，不論何資本家，若能成一小工店予他等以工作者，將必歡迎之。況資本家在中國寥若晨星，亦僅見於通商口岸耳。」（「實業計劃結論」）

此外，我們可以證明 國父也是一個總體戰的倡導者，雖說總體戰（Totale kriege 有譯總力戰，或全體性戰爭）的理論，倡導自德國名將魯登道夫，其根據是第一次歐戰的經驗和教訓。 國父所擬著「國防計劃」一書，亦係根據第一次歐戰的經驗和教訓，雖說該書尚未完成，而國父先逝世，在其擬就的該書大綱草案裡，卻可窺見 國父早已具有總體戰的觀念，——把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諸端和軍事一起來論列。（請參閱下章「國防建設」）又從本書「戰爭與政治」，「戰爭與經濟」，「戰爭與宣傳」諸章來看，更可證明 國父是總體戰的倡導者。原來 國父的思想是「迎頭趕上去」的，自然他的戰爭思想也不能例外。這一個總體戰的方式，正是我們今日反共抗俄戰爭的最高指導。

總之， 國父的戰爭思想是革命的，是救國救世的戰爭思想，換言之，是以「仁」為中心（註三）並以「世界大同」為最高理想的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。這個光明正大的戰爭思想是比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為進步與完美，（請注意！尚須表現於實際行動，方能發生偉大的作用）最後必能粉碎萬惡的共產主義的戰爭思想。我們應從速把它弘揚于全世界，蔚為民主國家戰爭思想的主流，爭取反共抗俄戰爭的早日勝利。

- （註一）見日本大陸問題研究所所長士居明夫中將著：「美蘇戰爭的預測」一書，一九五二年出版。
- （註二）國父所說的「奮鬥」，據我的研究，可分為和平的奮鬥，軍事或戰爭的奮鬥，他說：「軍官學校教學生，用槍砲去奮鬥，這個講習，是教學生用言語文字去奮鬥，即和平的奮鬥。」（「言語文字的奮鬥」講詞）
- （註三）國父說：「我們南方革命，大家知道犧牲了多少性命，流了多少鮮血，這是為甚麼？無非是想革命成功，造成一個很安樂的國家，讓人民可以享幸福，抱這種宗旨去奮鬥的軍隊，才是仁義之師。滇軍這次到廣東來，繼續顧總司令的志氣，為革命奮鬥，費了很大的犧牲，真是仁義之師，所做的大事，可算是一半成功。如果現在去北伐，收復江西，統一中國，便是要做的大事，完全成功。」（「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」講詞）